

胡朋志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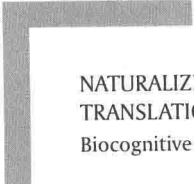
NATURALIZED STUDY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Biocognitive Perspective

翻译能力的 自然化研究

—— 生物认知视角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NATURALIZED STUDY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Biocognitive Perspective

翻译能力的 自然化研究

—— 生物认知视角



胡朋志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能力的自然化研究：生物认知视角 / 胡朋志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308-15609-7

I. ①翻… II. ①胡… III. ①翻译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7009 号

翻译能力的自然化研究

——生物认知视角

胡朋志 著

责任编辑	李海燕
责任校对	杨利军 仲亚萍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609-7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bs.tmall.com>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项目号：2013QN049）研究成果
宁波工程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绪 论 我们希望进行怎样的翻译研究	001
第 1 章 翻译能力研究的生物认知视角	011
第 1 节 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误区与翻译认知研究的兴起	011
第 2 节 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内在化路径	028
第 3 节 翻译能力研究的生物认知视角	035
第 2 章 程序性翻译能力研究:策略选择	047
第 1 节 直译、意译研究简述	049
第 2 节 基于 PACCEL 的语料统计与简要说明	051
第 3 节 从生物认知视角对直译、意译的重新解释	054
第 4 节 学生翻译过程中直译、意译的认知转换	058
第 5 节 进一步语料分析	061
第 3 章 程序性翻译能力研究:动态性	074
第 1 节 动态翻译研究简述	074
第 2 节 认知视角下对翻译动态研究的重新定位	077
第 3 节 学生译者动态翻译情况数据统计	080
第 4 节 学生动态翻译过程的认知假设	100
第 5 节 进一步语料分析	113
第 6 节 学生动态翻译能力分析	141

第4章 翻译认知过程中的意识思维现象研究:注意模式	150
第1节 翻译中的注意模式	151
第2节 注意模型与工作记忆	160
第3节 注意模式与翻译中的创造性	172
第4节 翻译认知过程中注意模型的表征与描述	183
第5章 翻译认知过程中的无意识现象研究	193
第1节 无意识决策现象简述	193
第2节 学生翻译过程中的无意识思维加工	196
第3节 学生翻译过程中无意识思维运用的影响因素	204
参考文献	232
索引	250
后记	253

绪论 我们希望进行怎样的翻译研究

一般认为,翻译研究经历了语文学范式、语言学范式、文化范式几个主要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的蓬勃发展,翻译认知研究也渐成大势。翻译研究各范式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直接替代关系,这一点与其他诸学科不同,尤其是与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不同。翻译学科的这一特异性源自于翻译研究在一个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变动不居:翻译到底是在翻译什么?

一直以来,翻译的对象多被限定为“意义”,这便使翻译研究出现了两种主要倾向:绝对化与多元化。“绝对化”受到传统客观主义认识方式的影响,将意义视为语言背后的一种绝对存在,它在翻译过程中不得受损,语文学与语言学研究范式属于这一大类;“多元化”坚持意义的多样性与多维性,认为意义难以被一致性刻画,更难以通过语言分析获得,文化研究范式属于这一大类。同时,意义多元化倾向还在后现代的浪潮中被不断解构,并大有被消解之势。翻译研究无论走在“意义”的哪一端,均有走偏的危险:要么走向绝对而不无偏激地追求忠实,要么走向多元而无所适从地寻求重构。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一直摇摆于上述两种意义之间,要走出这一现状,重新确立某种“意义”观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无疑只会将问题的解答延后,问题的根源依然存在。

放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视域中,翻译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在差异性之中找寻相似性的理解活动”。翻译因世界差异性的存在而必要,翻译又因人类理解中深层的普遍性和共通性而可能(Steiner, 2001)。翻译也就是相同与相异之间的博弈,相异的世界在可共通的人类认识能力中得以传递,从而不仅保证了翻译的可行性,同时也保证了人类认识世界结果的最大公约化。

据此来看,当前翻译研究中的不足体现为以下四项“分离”:

1. 语言与意义的分离

语言与意义的分离似乎是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设定,因为翻译被看做就是一种“保留意义、转换语言”的活动。这种分离随着语言符号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断得到强化。而分离的直接结果就是将“忠实”的标准强加给了翻译活动,翻译就此变成了语言转换操作,虽是个体化行为,但在众目睽睽之下,译者成为操作者,不仅必须恪守各项规则,更不可逾越原文的意义界限。在此情形下,不难理解为什么翻译成了“戴着脚镣的舞蹈”。

语言与意义分离的进一步“后果”是:语言工具化。语言完全沦为承载意义的工具,成为“意义的标签”(蒯因,2007),无所谓本质,更无所谓自主。没有了语言的自主性,翻译只能是标签转换,只能用“技术”甚至“机械”来形容。

2. 能指与所指的分离

Saussure 对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早已深入人心,但恰如他对语言“任意性”(arbitrariness)的定性部分遮蔽了语言的意象性一样,这一区分同样部分蒙蔽了译者的双眼。能指与所指区分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即语言是表达思想或意义的符号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作为能指的表示者(signifier)与作为所指的被表示者(signified)相对应,二者不可分割。对于翻译而言,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带来了两个主要的“隐患”。其一,作为系统的语言与作为整体的世界是对应的,因此,语言的翻译可以从语言背后的世界找到确定的依据;其二,翻译多是基于所指而进行的能指间转换。这两点将翻译引入客观化的路径,恰如 Searle 的“中文屋实验”中所描述的翻译过程一样,只要有合格的词典与恰当的程序,翻译可以在缺乏主体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只见形式不见意义的过程运作机制无疑是僵化的。Russell 的逻辑原子论、Wittgenstein 的图像论等理想语言学派尝试的无疾而终更进一步确定了这一研究道路的不可行。

3. 相似与相异的分离

翻译总是被定义为一种生产相似性的语际活动。这其中,相异的是语言,相似的是意义(抑或是神韵、功能或目的)。相异与相似之间的界限是如此分明,以致任何混淆或逾越均是不允许的。假如对于语言相异性没有足够认识的话,就可能会产生介于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翻译语”(translationese),这明显是不合表达规范的;同样,翻译过程中如果没有保持意义上的相似,那么该翻译多会被认为是误译。然而,“(翻译)尽管旨在生产相同性,但事实上它却不得不违反和破坏这种相同性,因为相同性必然要

被转变为他异性”(Sallis, 2002)。翻译腔的不可避免就是这种转变的一种证明,恰如即便我们闭上眼睛也可以听出一部影片是国产片还是译制片一样。追求相似的译文从未实现真正的“忠实”于原文,而只是如同“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将原文强行纳入译入语之内,将译入语所达成的意义效果冒称为原文的本原意义,从而在消除原文差异性、实现自我统一化的同时给人们造成了“译文=原文”的错觉(郝琳, 2009)。

相似与相异的截然二分既是语言与意义、能指与所指分离的结果,同时也是对上述两者的进一步强化。

4. 主体与客体的分离

对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地位的认识,翻译界走过了一条由无视到觉醒再到反思的历程。基于不同时期关注的焦点不同,我们可以将这一历程简要概括为:原文—原作者—译者—主体间—翻译生态。以“译者”为界,前期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觉醒,后期则体现了对译者主体性认识的深入与反思。然而,在整个主体地位变迁的历程中,主体与客观依然是彼此分离的,无论是后现代式的主体性意识膨胀还是翻译生态式的主体性备受制衡,主体依然游离于客体之外。换句话说,无论是在翻译视野上的横向扩展,还是对翻译过程反思的纵向深入,翻译研究近年来进步的同时给其自身带来了一些“成长的烦恼”——任何一次研究都得兼顾所有、面面俱到,因为在任何一个方面的考虑欠周均可能会导致“翻译生态”的失衡。在这一背景下,译者主体性意识的提升并没有最终形成以主体为动因的翻译过程性整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常是战战兢兢、顾此失彼。

上述四种分离将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引入了一种二分式的递归循环之中,无论是译者还是翻译研究者,一旦进入翻译领域,他们便不得不陷入是与否、同与异的取舍之中:从意义与表达到符号与指称,再到归化与异化,如此等等。在这一过程中,有关翻译的本质讨论会被无限地向后推延。

在本书中,我们将基于译者的认知主体性与自然化方法的科学性,尝试整合以上四对分裂的个体,建立翻译认识上的统一观。“翻译的统一观”视翻译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项活动,它是人类认识与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翻译对象的“意义”并不仅指称“语言意义”,更是指我们周围的世界在我们的认知系统中作为有意义的存在及其可能。基于此,翻译在功能与地位上与理解、分析等认知方式相似,在方式上与反思相似。我们认为,翻译中诸因素统一于主体、统一于行动、统一于认知、统一于自然科学,并且这些诸多的统一最终落实于译者实施的翻译认知过程之中,从而实现对译者

主体性的重新定位,并推动翻译研究的科学化。

依据由抽象到具体的次序,基于主体视角的翻译自然化研究可分述为以下四项主要内容:翻译的科学观、翻译的认知观、翻译的主体论与翻译的过程论。

1. 翻译的科学观

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学科,翻译研究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其本身的“科学性”问题。将翻译研究视为“科学”肇始于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随着语言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大量引入,翻译过程中的文本解读与译文重构过程被以形式语言为基础客观描述,翻译研究就此有了“科学性”。所以,翻译研究的科学性实质上来自于语言学研究的科学性,并且严重依赖于语言学自身科学化建设的成果。当结构主义语言学与早期生成语言学的科学性受到质疑时,翻译研究的科学性也就岌岌可危了。在现有有关翻译研究科学性的论述中存在着两个主要误解,一是认为翻译主要是语言转换,但很明显,翻译研究不同于语言学研究,仅以“科学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来实现翻译研究的完全科学化显然不太现实;二是认为 Nida 有关科学性的论述充分借鉴了 Chomsky 生成语言学的思想,然而,对于生成语言学的进一步了解显示,Nida 借鉴的只是 Chomsky 的早期思想,在其后续发展中,Chomsky 对语言普遍性的论述已经明显有所不同,而有关“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划分已经被完全抛弃。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既避免翻译研究的片面性(仅依据语言学),同时又保证翻译研究的科学性。我们认为可行的选择之一就是视翻译活动为人类认识活动的一部分并对其具体的认知过程进行自然化研究。这主要是因为:(1)以翻译行为内在的认知过程为研究对象,研究译者作为行为主体在翻译认知过程中的认知语境构建与决策考量,从而可以基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在认知科学的基础上实现对语言、文化、社会等各类翻译相关因素的纵向综合研究;(2)以翻译认知过程为研究对象,这使得借鉴认知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既有理论成果成为可能,而后者无疑是科学的。

2. 翻译的认知观

翻译的认知观基于对翻译过程中大脑“黑箱”的状态与运作机制的研究。大脑黑箱在当前科学水平下的确短时间内很难获得研究突破,但这并不表示它就应该被放弃,研究者完全可以通过试验、反思、描述等方式对其内在构成与运作方式加以“猜测”,并提出科学假说。依据现有研究与可观察的事实(大量存在的翻译活动),我们可以对翻译认知研究做出以下几点

“大胆猜测”: (1) 翻译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译者翻译认知过程这一实际存在的事件客体,而不仅仅是常识所理解的译者理解与表达的个体活动; (2) 翻译行为本身是一个多因素交织的综合体,无论翻译相关因素多么复杂,社会因素多么强势,翻译行为均是由译者来实施的,因此,对译者实施的翻译行为加以认知研究同样也属于综合研究; (3) 译者在实施翻译行为时表现出的翻译认知处理能力即为“翻译能力”; (4) 翻译能力基于人类的生理基础与一般认知能力,具有普遍性和可习得性。

这些“大胆猜测”的方法论优势在于: (1) 可以摆脱对什么是翻译研究本体的长期争论,明确翻译学科研究的对象; (2) 避免不必要的研究范式之争,以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与译者翻译能力研究整合翻译行为可能涉及的各方面因素; (3) 以认知科学为基础,实现对翻译行为研究的科学化与对翻译能力研究的自然化,避免研究中对“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人为划分; (4) 明确翻译研究的科学定位。

3. 翻译的主体论

译者主体性的几个主要特征如下。

首先,主观性(subjectivity)。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始终是唯一的主动因素,无论是阅读、理解还是表达,他们均是以自己主观的思考所得来做出判断与选择的。应该说,主观性是最为当代的翻译研究者所耻于提及的,因为如果谁公然宣称翻译过程是主观的,这也就等于宣布他承认翻译过程因人而异,具有不确定性。这种心态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后现代主义过度解构之后人们认识上的一种正向回归;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它源于自然科学确证观念对人们思维的深刻影响。然而,主观性并不等于随意性。相反,主观性恰恰是人类能动性与认识能力的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观性越明显,就越说明其作为主体对翻译活动参与的积极与深入。

其次,内在性(internalization)。内在性是对主观性的进一步阐释。内在性包括两个方面:译者认识状态的存在方式与这一状态发挥功能的途径。如同其他任何社会角色一样,译者也需要一定的认识能力与知识储备,但无论是“能力”还是“知识”,它们均存在于译者大脑内部。如果译者要学习新的知识,那么它们也必须先进入译者的“大脑”成为其认识状态的一部分才能发挥作用。同样,译者认知能力发挥的途径也是内在化的,即使译者被迫从事翻译,他们也必须先意识到这种强迫性本身才能实施被要求的翻译行为。

再次,因果性(causality)。因果性指在译者内在认识状态与外在翻译行

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设想一下:(1)我感到渴了,我倒了杯水喝;(2)我平时不敢乘坐过山车,但今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坐了。这两则例子中都包含着因果性。可能会有人争辩说(1)中的结果不是由主观的“渴”引起的,而是由身体的生理神经系统引起的。这种说法显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的生理神经系统引起了渴的感觉,后者进一步引起了“倒水喝”的动作。在理解翻译活动中的因果性时,有两个误区,分别是休谟式的因果怀疑论与物理主义式的因果确证论。前者受制于经验的因果偶然性而不承认有因果关系存在;后者则依据物质世界因果闭合论否认在意识与物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哲学史上前者被称为“怀疑论”,后者被称为“独断论”。翻译研究中,在自然科学尚未解开认识之谜之前就无视常识(心物因果性的存在)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

在翻译过程中,主观性、内在性与因果性的关系可以简述如下:(1)以主观性为特征的译者内在认识状态是译者翻译能力形成的依据;(2)这种内在认识状态同时也是翻译活动的实际心理起点;(3)从起点出发到翻译行为的具体实施过程体现了由内在认识状态到外在行为的因果实现关系。

4. 翻译的过程论

在当前翻译研究界,对“翻译过程”这一术语通常有两层认识。第一层指翻译活动从准备到完成的顺序过程。这一层认识较为常见,Nida 模式、Lörscher 模式与 Bell 模式均属于此。这一层认识上的过程研究属于描述型研究,研究者多以翻译任务完成为导向,以译者行为描述/记录为依据,尝试通过对一系列翻译步骤的描述,完整重现译者的翻译过程。第二层指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大脑这个“黑箱”中经历的思维过程。这一层认识上的过程研究属于解释性研究,研究者希望基于内在神经生理层面的研究发现,解释译者外在的翻译行为,部分翻译认知研究与翻译心理学研究属于这一层次。

翻译过程的两层认识相互之间并不孤立,更不会冲突。以 Lörscher 模式与 Bell 模式为例,虽然两者的最终研究成果都只是以过程描述的形式呈现,但他们均强调自己研究对心理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研究成果的最终依赖,而“心理语言学还对语言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感兴趣,研究语言的生理和神经基础”(桂诗春,2000:2),认知科学更是强调对心智现象生理实现的终极追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Lörscher 与 Bell 等人对翻译过程的描述是整个翻译过程研究路径中的阶段性成果。但对于一个研究领域而言,从过程描述走向对过程的神经生理解释才应该是更高的追求。这也就要求相关研究

应该从上述第一层次的翻译过程走向第二层次的翻译过程。

显然,我们的研究无法实现对翻译过程中大脑“黑箱”的精确解释,但通过借鉴 Chomsky 从描写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走向解释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的研究路径,我们希望建立一种相对合理的翻译过程解释模型。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推动基于主体认知的翻译能力自然化研究呢?

1. 自然化的研究方向

自然化的研究方向缘起于一个基本的知识论疑问:我们如何在贫乏的感觉刺激的基础上构建起关于世界的丰富的理论?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只能从经验事实起步,但同时也必须要超越经验走向理论性认识。在传统研究中,从经验走向理论的道路只有“归纳”一条,“归纳”在“演绎”的帮助下建立了整个理论体系。但“归纳只是确定某种量值,而演绎则是从一个纯粹假说推论出其必然的结论”(Peirce,1998),两者难以形成新的认识。因此,在本课题研究中,我们将借鉴生成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在具体研究中这一原则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分别被称为“溯因推理”(abduction)与“伽利略—牛顿风格”。前者强调认识是一个基于人类的天赋认知能力与可观察事实形成解释性假设的过程;后者要求我们尝试去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而不只是满足于对世界现象的描述,并基于此努力构建有关世界的最好解释性理论。

通过运用“方法论的自然主义”,我们将基于现有研究与具体翻译经验,对译者的翻译认知能力(翻译能力)做出大胆“猜测”,并基于此构建有关翻译认知过程的理论假说。同样是基于这一方法论原则,在研究中,我们将不会因为认知科学给我们提供的确定性认识有限而故步自封,也不会因为研究结果的可谬性而止步不前。

2. 认知科学的基本视角

鉴于本课题确定的研究对象是翻译认知过程,而译者作为认知过程的唯一主体与翻译行为的实际实施者,其翻译认知能力(翻译能力)必然成为首要的研究内容。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将基于认知科学的基本视角,着重讨论以下几个基础性问题。

(1)翻译能力的来源:天赋 VS 习得。Chomsky 坚持认为语言官能既是人类的认知器官,同时也是人类的生理器官,具有明显的生物属性,是(生物)天赋的。对于人类而言,翻译认知能力虽然不及语言能力那么基础,但它包含的生物性因素也同样不应受到忽视。这一认识看似是常识,但它的

意义在于:明确了翻译认知研究的一个基本维度——生物学维度(可能涉及神经科学、脑科学等具体学科领域),从而引导翻译研究在文化转向之后对翻译能力本体研究适度回归。当然,由于翻译能力不是人类最为基本的认知能力(如语言能力、视觉能力等),因此,基于具体经验的后天习得对于翻译能力形成同样重要。这进一步要求我们区分专门的翻译认知能力与一般认知能力,深入认识翻译能力的来源与构成。这一区分的意义还在于,明确了翻译能力不同部分的形成机制,可以为翻译能力的培养提供有益的指导。

(2)翻译能力的属性:社会 VS 个体。对于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来说,翻译行为首先是个体行为。这一说法可能会令部分人心生疑惑,因为依据一般理解,翻译活动作为人类语间交际的一种基本形式一定是社会性的。澄清这一疑惑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翻译认知研究的研究对象与理论旨趣。翻译认知研究的研究对象是翻译认知过程这一“事件客体”,而不是作为社会化行为的“语间交际活动”。对于这样一种“事件客体”来说,译者的翻译认知能力是主动因素。“主动”(与“被动”相对)指的是该因素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可以行使“因”的功能,基于它的产生与变化,事件的发展进程与结果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在翻译认知过程中,认知行为总是由个体行使的,因此,客观上个体是其中的(唯一的)主动因素。承认这一点与是否承认译者的“主观”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在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中,所有的翻译认知行为均被看做是客观的现象。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翻译认知研究关注的是个体的翻译认知行为,虽然这些行为本身无疑具有社会意义。

(3)翻译能力的发挥:有意识 VS 无意识/潜意识。基于自然科学研究模式,翻译认知科学研究就必须客观描述翻译过程中实际发生的翻译行为(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解释作为行为主体的译者的认知过程,说明其翻译能力发挥的途径与方式。行为中有意识与无意识/潜意识的区分同时要求我们弄清楚能力与知识的关系。首先,能做什么并不意味着一定知道什么。举例来说,我们不需要在每一次看之前先意识到看的行为;同时可能的情况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却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看到了,但事后的某个情境会突然激发我们对这一次看的记忆。这一点解释了一些翻译实践家对翻译理论的不屑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知道”任何翻译理论,但却明显具有一定的翻译能力。分析、解释这一事实无疑是翻译认知研究的理论任务之一。其次,知道什么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就能做什么。以外语学习为例,学会了一门外语的语言规则知识并不表示学习者已经获得了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翻译学习也是这样,学生不可能通过学习一些翻译理论

与翻译技巧就立即实现翻译能力的提高。这充分说明意识甚至是理性思考并不一定会转化为我们实际行为的能力。从知识到能力的过程是认知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对于这一点翻译认知研究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

(4)翻译能力的约束:规范 VS 因果。对主体行为能力发挥构成约束力的因素,在自然界是客观的自然规律,在社会领域是社会规范(法律、道德等)。基于这种认识,自然科学研究的目标在于发现并恰当运用自然规律,而社会科学的目标则在于制定并实施社会规范。翻译行为是由个体实施的社会性行为,这样的理解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对于翻译认识研究而言却不够全面,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没有区分理论发现与对理论发现的运用。我们在之前已经明确指出,翻译认知研究以客观解释翻译认知过程为目标,属于自然科学范畴。那么这一研究的目标就在于发现翻译认知过程中的自然/客观规律。只有在这一研究有所发现并且这些发现已经为后续翻译实践证实的情况下,我们才谈得了对研究发现加以运用的问题(制定规范指导翻译行为)。因此,单就翻译认知研究本身来说,制定翻译规范并不是它的研究目标。既然自然科学以发现为目标,不接受任何先入为主的“规范性”观念约束,那么翻译认知研究也就无须太在意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既有的行为规范。换言之,翻译认知研究关注的就是具体的翻译行为与行为的“前因后果”。当然这并不是说既有的翻译规范对译者不起作用。作用的确存在,但在翻译认知研究中,我们只关心译者实际上考虑到了哪些因素与要求,并且这些因素与要求是如何在客观上影响翻译结果的。因此,在这种研究范式中只有“事实”,没有“规范”;只有“因果”,没有“合理”。

3. 内在化的研究路径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以内在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译者主体性问题。“内在化”是认识科学与心灵哲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其具体实施需基于以下两个途径:认知实证与心灵反思。“认知实证”指运用科学试验的方法与心理学、神经科学、脑科学、生物学等多学科视角,从内部来解释或验证人类的认知能力。“认知实证”始终是首选,但鉴于当前的认知科学水平还不足以为人类的认知活动与心灵现象提供足够的实证依据,因此在很多研究中“心灵反思”便显得尤为重要。“心灵反思”强调在不违背科学认识的前提下,以反思为手段探求心灵认知活动的内在过程与特征。“内在化”的研究路径在实际研究中应用十分普遍,在心灵哲学、语言学、翻译研究领域,分别以 Searle、Chomsky、Bell 的运用最为著名。其中 Searle(1997)对意识与意象性的解读、Chomsky 对语言本质(Chomsky, 2006)与语言生成过程(Chomsky, 1995b)的

解释以及 Bell(1991/2001)对翻译过程的探索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本研究中,基于翻译经验事实而进行的内在化反思将是我们进行理论构建与论证的主要手段。这一研究从一个基本问题起步:作为译者与研究者,我们自己注意到的(翻译相关)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显然这里我们没有直接采用横向因素分解与纵向社会关注的视角,这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相反,它们在本书中已被当做研究背景默认了。换句话说,翻译中的其他各项因素都是外因,它们是否被运用、如何被运用均取决于译者这一翻译活动实际主体内因的发挥。所以,对翻译过程加以内在化的研究才是翻译认知研究的必然选择。

第1章 翻译能力研究的生物认知视角

第1节 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误区与翻译认知研究的兴起

1 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误区

传统翻译研究多数关乎翻译标准。自古至今,专业人士总希望借助“标准”之力约束译者行为,规范翻译结果,提升译文质量。所以翻译标准以其约束之名代替了翻译能力培养之实。翻译学习者不得不以标准为参照,实践中战战兢兢。

不仅如此,对翻译标准的研究也一直与误解相伴。这些误解首先表现为对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标准不加区分,理所应当认为翻译标准就是翻译批评标准;其次表现为在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追求对翻译标准的知性表述,力求实现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最后表现为随着现代主义衰微,后现代主义兴起,人们对价值追求的多元而坚持翻译标准理应多元化。

误区一:翻译研究多关注译后评价而非过程指导

对翻译规范的追求古今有之,中外有之。纵览中国翻译史,最早的翻译标准来自于佛经翻译实践。自支谦提出“用意译取代音译,……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胃”(马祖毅,1984:23),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主张翻译必须力求合乎原文原意,唯惧失实”(陈福康,1992:20),直至玄奘的“五种不翻”(陈福康,1992:40—43),中国最早期的翻译理论就为翻译界的后来者们拟定了一条规定性的道路。时至近现代,规